

看展去

# 我们的春节，世界的节日

■ 毕旭玲

## 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

春节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多元文化元素的吸收融合，也有向海外的扩散传播。许多国家和地区把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春节。基于中国春节广泛的国际影响力，2023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春节确定为联合国假日。毫无疑问，春节已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

本展览策划了“欢庆春节的主要海外国家”展项，显示了与我们一起庆祝春节的36个海外国家在六大洲的分布情况。

中国春节之所以能广为传播，是因为它具有吸收容纳多元文化元素的超强包容性，这也是中国春节的一大魅力。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可以观察到意想不到的春节面向。

今天仍广受欢迎的鱼龙灯彩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在汉武帝宴请西域诸国使者的宴会上出现的一种名为“鱼龙曼延”的大型幻术表演。“鱼龙”含有鱼龙变化之意，“曼延”指巨大的兽。鱼龙曼延的形成受到了西域杂技与魔术等民间艺术的影响，后来成为汉代皇家新年朝贺的重要表演项目。由于它寓意吉祥，后世还称之为“百戏”(中国古代民间表演艺术的泛称)的代表，称“鱼龙百戏”。唐宋以后，从鱼龙曼延中演化而成的鱼龙舞与灯彩相结合，逐渐成为元宵节中最重要的项目。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有“一夜鱼龙舞”的描述，说明宋代鱼龙灯彩表演特别受欢迎，几乎彻夜不停。一直到清代，鱼龙灯还是最有代表性的元宵灯彩。

起于印度的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后，对春节的发展也产生过重要影响。比如出现于北宋的腊八粥习俗就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东京梦华录》记录北宋都城开封(今属河南开封)的腊八粥习俗说：“(十二月初八日)……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武林旧事》描述南宋都城临安(今属浙江杭州)的腊八粥习俗说：“(十二月)八日，则寺院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蕈(小蘑菇)、柿、栗之类为粥，谓之腊八粥。”

元宵张灯习俗也是受佛教影响。大约在东汉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境内的传播，僧人正月十五点灯敬佛的行为扩散到民间，逐渐催生了元宵张灯仪式。南北朝时，元宵节张灯已见诸文献，梁简文帝曾作《列灯赋》。

## 汰旧出新的节庆形式

中国春节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汰旧出新。比如先秦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了祭灶行为，但祭灶时间并不固定，灶神的地位也比不上供奉在居室西南角、主宰整个房屋的中霁神。汉人已有过小年的习俗，但汉人的小年是尊师敬长的吉日，与祭灶无关，正如崔寔在《四民月令》中所写：“腊月日更新，谓之小岁，进酒尊长，修贺君师。”从晋到唐，灶神神话不断发展成熟，灶神被塑造为天帝的督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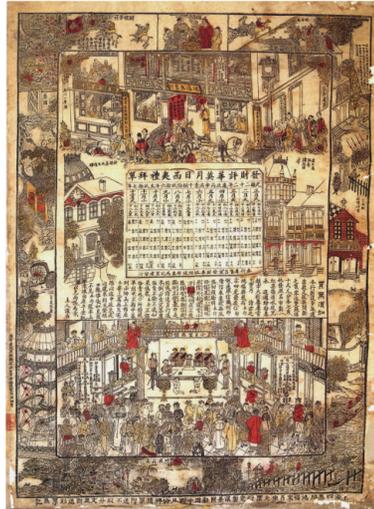


▲ 民国时期世界书局贺年卡

近日，“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展在上海社会科学馆(上海图书馆东馆六层)开幕。本展览由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上海市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研究中心承办。展览以时间为序，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传统春节在江南地区从准备活动到庆祝仪式的全过程。

春节(中国农历新年)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蕴含着中国人对于种族延续、文化传承、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认知与想象，于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策展人毕旭玲特别撰文，讲述本次春节展与众不同的四大看点。展览将持续至2024年3月初。



▲ 月份牌年画《沪景开彩图》，杭稚荃绘，表现清末中国最早彩票吕宋票的销售盛况



▲ 清代民俗版画《武财神关公》



▲ 20世纪前期上海纸马《定福宫》



▲ 民国灶神画



▲ 清·冷枚《百子图》(局部)，现藏故宫博物院

能掌管人寿命的司命神，有“东厨司命”之称。祭灶时间也经历了从夏天祭祀到晦日祭祀的变化，最终在宋代将腊月二十四确定为祭灶时间。

又如元宵社火的雏形是对社稷神和火神的祭祀仪式。大约在南宋以后，社火传承转变为民间节日歌舞，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中有“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呈”一句，表现了南宋江南民众在元宵节期间闹社火的场面，作者自注说：“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社火往往以行街表演的方式在街头巷尾进行，《梦粱录·元宵》记录了南宋杭州元宵节期间花样繁多的社火行街表演，不仅有数十支普通舞队，“更有乔宅眷、旱龙船、踢灯鲍老、驼象社。官巷口、苏家巷二十四家傀儡，衣装鲜丽，细且戴

花朵肩，珠翠冠儿，腰肢袅娜，宛若妇人”。“乔宅眷”“踢灯鲍老”都属于滑稽戏，“驼象社”似为马戏表演，“傀儡”即木偶戏。闹社火体现了元宵节的狂欢性质，因此南宋以后的元宵节可以被视为中国传统“狂欢节”。

再如清末出现在上海的月份牌年画，是在传统年画基础上，将年画与日历、商品广告合而为一的新年画。传统年画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汉代的门神画，正式出现于五代、北宋之际，在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传统年画题材包罗万象，包括神仙瑞兽、世俗生活、娃娃美人、传说故事等，并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明显的地方流派。清末，传统年画在上海首先发展出了月份牌年画的新形式。月份牌年画内容多表现美女或古代传说故事，画面上往往附有年历及节令

表，并绘有商品或商号名，在年终岁尾时随商品赠送客户。不少月份牌年画记录了开埠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是珍贵的历史图像。

## 精致开放的江南风貌

江南地区的春节有其独特风貌，精致而开放。

展览展示了一些春节期间使用的民俗纸马图像。纸马又称马张，是一种用作民俗祭祀的木刻版画神像。“马”是“马上”的意思，表达了希望神灵能迅速接收祈祷的愿望。纸马约始于唐代，至明清时已十分盛行。纸马上的神灵种类繁多，不可胜数，且大都有具体职司，如守门的门

神、守灶的东厨司命、守井的井泉童子、守水缸的水仙娘娘等。纸马是一次性祭祀用品，往往祀后即焚，因售价便宜，大都采用简单的单色印刷技术。但江南地区的纸马格外精细，不少江南纸马均采用套色印刷技术，成品色彩艳丽，神灵形象生动。

20世纪前期出现的贺卡拜年习俗是传统投名帖拜年与西式贺卡融合的产物。从宋代开始，投名帖拜年是拜年的一种方式，南宋《癸辛杂识》载：“序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一束刺签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常。”拜年名帖以大红色或梅红色纸制成，上书受拜人的姓名、住址和恭贺文字等。投名帖拜年的方式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特别盛行，“吴俗拜年，无论识与不识，望门投帖，宾主不相见，登簿而已。答拜



清·丁观鹏《太平春市图》(局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第578期

# 全球史时代的丝绸之路研究

细小与偶然：守正与创新

■ 马伟

“丝绸之路”是一个极具复杂性的概念，尽管德国学界之早已使用过该词汇，但是自1877年李希霍芬首次将“丝绸之路”限定在中国至地中海世界之间，才真正称得上是丝绸之路研究的起点。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丝绸之路”概念已被广泛使用，其指涉与内涵不断模糊与延伸，已逐步从“区域史”上升到了“全球史”的范畴。一方面，冠以“丝绸之路”名义的研究蔚为显学；另一方面，有关“丝绸之路”概念的争议也无时不有。中文学界使用“丝绸之路”概念的时间较晚，很长一段时间里，“中西交通”一词为人所熟知，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直至21世纪以后，变化开始出现，丝绸之路研究形成热潮。如何既接棒清季以来的“西域南海之学”的传统学术脉络，又真正与国外同行在同一个平台和高度开展学术对话，是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罗丰《秦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在2004年首次出版即获得年度全国文博考古最佳论著，二十年后推出修订本。本次修订在内容上增益甚多，体现了“守正与创新”并重的学术理念：修订旧文，同时替换三篇，新增《邦国来朝》台北故宫藏《职贡图》题材的国家排序《从山陵为贵到封土不封树——北朝墓葬封土的转变》《北周李贤墓出土拜庭金饼仿制品》，使全书更加符合“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这一研究主题，同时也体现作者近年来有

关丝路研究的新成果与新突破。此外，更新了部分文章的插图，如外国金银币、漆器画采用了更清晰的图版，对一些线图也进行了重绘，以图证文，更方便读者引证；并重新制作了索引，补充了重要人名、地名索引词。

过去，学界对《职贡图》印象大都来自传为梁元帝萧绎所作绘本，虽然成果卷帙浩繁，但讨论主要集中于旧藏南京博物院宋本，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为阎立本《王会图》和唐南唐顾德谦摹本《梁元帝蕃客图》则相对措意较少。在《邦国来朝》一文中，作者选择从国、族名称入手，仔细比照异同，依照其特征分析出这两种传本与《职贡图》存在一定的承袭关系，认为残缺的《职贡图》所缺少的国家和部族排列关系，或许可以通过两种传本的完整信息来呈现，从而体现出南梁与周边国家的利害关系。最后还就《职贡图》文献资料的来源做出推测，认为《职贡图》的图记文字来自官方档案的可能性更大，这主要是因为官修史书在摘录档案时具有明显的便利性。将图像还原于特定文本，可谓利用新材料讨论旧问题。

考古学是20世纪舶来中国的新学术，考古工作者的视角与观察是明显不同于传统文献史家的。学界曾对墓葬封土起源与发展关注颇多，但是对于封土的堆砌过程却鲜有关注。在《从山陵为贵到封土不封树》一文中，作者从北朝

时期地上封土形制与地下房屋模型的起源与发展问题入手，认为孝文帝改革后，“孝悌”观念影响了墓葬封土的营建，汉代流行的祠堂建筑也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墓葬地下设施；北周时期，受“不封不树”薄葬思想影响，地上封土规模进一步缩小，一种以长墓道、多天井、单室或多室墓的全新规制普遍出现并成为了隋唐时期关中地区同类型墓葬的先河。在分析中，作者利用固原北周田弘墓封土的发掘与解剖复原了封土堆砌的全过程，并通过计算封土四侧土方堆积量的多寡大致推算出二次葬的位置从而得出封土顶部偏移的原因。田弘墓封土的发掘以及由此得到的有关封土堆砌过程的复原，对于讨论北朝晚期至隋唐合葬墓二次下葬方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北魏时期封土下建筑设施起源议题的讨论，对现今十六国晚期至北朝早期墓葬内土雕房屋模型的形制溯源问题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18世纪中期俄国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成员在其彼得堡庄园内发现第一件萨珊银币至今，学界对胡瓶形制已有直观认识，将其分为粟特型、萨珊型和突厥型。其中萨珊型胡瓶最典型者要属固原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瓶，讨论尤多。《北周李贤墓中亚风格的鎏金银瓶》一文，尝试通过构造、图像、人物故事内容、艺术风格、刻画铭文、产地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对银瓶作全景式观察，

提出新的问题。首先，作者梳理廓清“胡瓶”这一概念，在《太平御览》转引《前凉录》的影印本原文中发现“胡瓶”应为“瓶”字，继而通过梳理包括《十六国春秋》在内的文献中银瓶、金瓶相关记载，认为胡瓶最早当在西晋时期已经传入中国。随后，通过图像志分析和形制比较，作者认为李贤墓出土银瓶应属巴克特里亚风格。最后，通过分析鎏金银瓶制作工艺，还发现了银瓶鎏金的部位充分考虑了与器形和图像的关系，使李贤墓银瓶的相关讨论形成定论。

对标国际一流学者，探讨“核心议题”，是近年人文学术的主题。银瓶一文，作者在结构上借鉴了深井晋司《阿那斯塔塔女神装饰鎏金银把手付水瓶》议题之相近，但在材料挖掘方面更具深度，兼顾东、西洋。除阿尔米塔塔博物馆藏品外，还使用了包括亚瑟·厄普姆·波普《波斯艺术综览——从史前时代到现在》与田边胜美《古代东方博物馆——文明起源的探源》在内的众多银器材料，同时发掘特殊且鲜见材料，如首次向学界介绍斯特罗加诺夫在西藏贵族手中获得的“一件银碗，其银转英国、日本两地，现藏日本古代东方博物馆，经作者分析认为其属于巴克特里亚风格，于公元7世纪传入吐蕃。

考古学研究人类遗物常常伴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尤其是奢侈品。它们的存在完全是一种极端不确定的结果，所

者亦如之。一月中奔走如织”(《晒书笔谈》)。开埠后，随着印刷业和邮递网络的发展，西式贺年卡进入上海。通过邮局寄送印刷贺卡的方式显然比派人上门投递手书拜年帖更便捷，于是投名帖拜年的传统方式逐渐被寄送春节贺卡的新形式取代了。

南北交融、中西合璧的上海年夜饭经典菜式也体现了江南春节、更准确地说是海派春节的开放性特征。年夜饭又称团圆饭、团年饭，源自古人腊祭后与祖先团圆聚餐的仪式。上海传统年夜饭祈求吉庆的意味十分浓厚，不少菜肴都有以“元宝”和“如意”为主题的名称，如蛋饺是形如元宝的“金元宝”，百叶包肉是“如意卷”。但在当代堪称经典的上海年夜饭菜式中，大量菜式都是在开埠后南北移民与上海本地居民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比如扣三丝源自扬州菜，白斩鸡来自粤菜，八宝鸭则是苏州地区的传统名菜。还有一些年夜饭菜式是吸收异域饮食文化特色后产生的新菜式，比如上海色拉，就是有名的“中式西餐”。

## 古今联动，再现习俗

作为岁首的春节在中国传承了两千多年，早已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与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力量。但时至今日，春节的不少习俗与仪式渐趋淡化，我们尝试通过展览培养观众尤其青少年对春节的亲近之情。

比如设置武财神拼图互动，是为了引导青少年正确理解中国人求财致富的心理与“以义取利”的传统义利观之间内在的一致性。正月初五迎财神是传统春节习俗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古人的祈财纳祥之心。中国古人创造的财神形象很多，著名的比如文财神比干、范蠡，武财神关羽、赵公明。但古人塑造的财神皆是善良正义的代表，比干忠义直谏，关羽义薄云天，范蠡散财济困，赵公明降妖除魔，他们的神话和信仰都说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又如一些已不为人知的习俗，展览上加以改造再现。走三桥，也称“走百病”，指正月十五夜，通过步行跨过三座桥梁祈求祛除一年疾病的习俗，可能起源于明代北京地区，后来在江南各地普遍流行开来，成为最受欢迎的女性专属元宵节俗活动。民国时期上海女性最喜爱走的三座桥是小东门的益庆桥、天官牌坊南的长生桥、邑庙东的如意桥，三座桥名合起来是“益庆长生如意”，寓意平安吉祥。我们制作了三个小型木拱桥，并分别以益庆桥、长生桥、如意桥命名，不仅烘托了展览的江南特色，更让活泼好动的青少年在玩乐中增加对春节的兴趣。

“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展的四大看点实际上也是从文化交流、文明发展的高度和区域文化发展的角度，对中国春节传承与保护问题的再认知。今天，我们在建构春节的独特文化符号之外，也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使传统春节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希望这次展览能引发更多人对于传统节日保护问题的关注和行动。(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带来的后果只能在这样的基础上推测。总结起来，这些粗看或许是毫不相干的主题却都是本书的核心议题，胡汉之间，也正因为书名。《修订版序言》中如是说，这或许是作者对考古资料能否复原古代社会一贯所持谨慎态度的显现。

美国历史学家韩森也曾指出：“如果说任意时间点的运载量、交通量或旅行者人数是评估一条路线重要性的唯一标准，那么丝绸之路可说是人类史上旅行量最低、或者是最不值得研究的一条路线”。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研究丝绸之路呢？作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对细小问题的长时间思考，固然会失去系统处理问题的机会，细小问题本身可能也会影响问题的系统性，但是对它们的多角度观察，仍是使我们认识古代世界的唯一窗口。因此，全书力图解决的各个问题与其说是“碎片化”呈现，毋宁说是对当前学界司空见惯的架空立论和热衷“大历史”“普遍性”的纠偏。丝绸之路在本质上是交流之路，由此产生的接触、交互、吸收和转化虽是片面和零散的，但是“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或许我们需要沉下心来思考更多“碎片式”的问题，发掘人未发之覆，让这些碎片最终汇聚成江海。“接续传统、接轨国际；回归实证、对标前沿”，相信会成为中国学者丝绸之路研究的主调。(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